

# 一對「佳美腳蹤」—— 記抗戰時期美國、挪威女宣教士

劉義章

建道神學院

Alliance Bible Seminary

## 一 引言

八年抗戰（1937-1945年）是中國在現代史上所遭遇到最嚴峻的考驗，中華民族陷於苦難深淵、國家瀕臨滅亡關頭。戰爭對中國造成龐大的人員傷亡和巨大財產損失；<sup>1</sup> 並深遠地影響日後中國的命運。中國最終戰勝日本的侵略，乃基於無數官兵和同胞所作的英勇犧牲。先烈和先

---

<sup>1</sup> 「中國先後徵發兵員一千四百萬人，傷亡官兵三百二十萬人，人民生命犧牲以千萬計，財產損失約四千八百八十億美元。」 「人民傷亡達一千八百餘萬人，軍隊傷亡近四百萬人。」 "On its part, China mobilized 14 million men, sustained total casualties of 3,211,419-including 1,319,958 killed, 1,761,355 wounded, and 130,126 missing-and incurred an awesome war debt of Ch\$1,464 billion." 分別引自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79），頁738；張憲文主編：《中華民國史綱》（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頁631，以及Immanuel C. Y. Hsu, *The Rise of Modern China*, 6<sup>th</sup> ed. (New York &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611。

賢們（包括來華宣教士）可歌可泣的事跡和流露出生命的光輝應永遠被人們記念。在國家存亡之秋，無數外國宣教士不避漫天戰火、不計個人生命安危，毅然千里迢迢來到中國，為正陷於苦難深淵的中國同胞伸出援手。

基督新教於十九世紀初入華以來，曾流傳「多一個基督徒，就少一個中國人」的說法。睽諸抗戰的歷史，基督教入華以來，中國人非但沒有減少反而增加了。這是因為信仰耶穌基督的國人仍然深愛祖國和同胞，辛亥革命首義烈士陸浩東和許多革命領袖楊衢雲和孫中山等都是基督徒。同時，來華宣教士有些選擇歸化中國籍，如原籍比利時、於1901年來華的雷鳴遠神父（Father Vincent Lebbe, 1877-1940）。抗戰期間雷神父組織救護隊和戰地督導民眾服務團，在華北和華中救護傷兵和救濟飽受戰火蹂躪的中國老百姓，並且親臨前線指揮工作。他以「全犧牲、真愛人、長喜樂」為座右銘，並以此勉勵同工，無數傷兵得到緊急救護，許多同胞獲得及時援助，為中國抗戰事業作出巨大貢獻。<sup>2</sup> 1922年來廣西梧州的美國宣教士劉福羣牧師（Rev. Dr. William C. Newbern, 1900-1972），在中國事主四十多年，致力於中國神學教育（在建道神學院事奉三十五年），大半生奉獻給拯救華人靈魂的偉大事業。他在與學生共同挖掘成的防空洞上課，率領神學生轉移途中遭到日本戰機掃射。劉牧師為使中國人得聞福音而「完全委身，他愛中國人，甚至『比中國人更似中國人』」。<sup>3</sup>

本文述說何義思教士（Miss Ruth Howe Hitchcock, 1892-1984）和司務道教士（Mrs. Annie Skau Berntsen, 1911-1992）在抗戰期間服事中

<sup>2</sup> 筆者在香港的調景嶺成長，經常聽到與鳴遠中學（紀年雷鳴遠神父）比鄰的天主堂那清亮而悅耳的聖誕鐘聲。筆者曾在台北市拜訪雷鳴遠神父的弟子曹立珊神父，他是鳴遠中學的創辦人。

<sup>3</sup> 建道神學院教授朱裕文牧師（建道1969班校友）訪問記錄（建道神學院，2011年3月29日）。轉引自彭仲怡：〈劉福羣牧師生平與事工研究〉（建道神學院道學碩士論文，2011），頁27，注釋104。

國同胞的情況。<sup>4</sup> 何教士生於美國南加州，1914年來華宣教，服事中國人逾半個世紀，主要在華南一帶傳揚福音、救貧和恤孤。抗戰期間堅持救助中國同胞，收容大批孤兒和難童，成為「多人之母」。<sup>5</sup> 司務道教士於抗戰翌年（1938年）從挪威家鄉啟程來華，一直在陝南從事醫護和救濟事業，與陝南同胞同度患難直到抗戰勝利。<sup>6</sup> 何義思教士和司務道

---

<sup>4</sup> 除了何義思教士和司務道教士，本文提及何教士的前輩宣教士翟恩憐教士。此外，屬於德國平安園的路德會姊妹馮晨星三姑（Sister Marie Luise von Mengersen）和Sister Margaret Seeck 兩位傳教士，從1924年就來到官山與何教士同工。何義思著，李思敬、盧詠儀合譯：《誰掌管明天》（香港：香港宣道會希伯崙堂，1975年6月初版，1997年12月七版〔修訂三版〕），頁48。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兩位德國籍傳教士守護了官山工廠的事業。何教士這樣記載：「兩位德國姊妹仍是時常緊守崗位，料理所有事務，弄得井然有序。直到戰爭結束，我再回到官山時，一切都和四年前無異。」何義思：《誰掌管明天》，頁127。

<sup>5</sup> 李盧媛玲（李弼標師母）：〈福氣由何家園起〉，何義思：《誰掌管明天》，頁209。何義思教士早於二十年代即與長洲結緣。1927年的「排外運動」迫使宣教士離開工廠，到香港暫避。「主已經在為我們預備了房子，到時她們（何義思教士的同工何秀馨姑娘、傅晨光姑娘和兩位德國姊妹）可以全部遷到那裏。後來，不單她們，甚至連在廣州的一些朋友也遷到長洲；房子頓時身負重任。當難民湧到香港，所有的房子都擠滿了人，神為我們安排了這個避難所；祂莫測的恩惠、周詳的計畫，遠超過我們的思想。」何義思：《誰掌管明天》，頁64。去年筆者轉職到建道神學院事奉，我的宿舍所在正是何教士當年捐贈予學院作為教師之用：真正做到「奉獻的程度是不為自己留下分文」。抗日遊擊隊長稱她作「西樵大恩人」。何義思：《誰掌管明天》，頁124。感謝上帝厚恩讓筆者信主初年即遇到屬靈偉人——何義思教士。何教士長留於筆者腦海中的印象是：她那謙遜氣度，和藹笑容和慈祥臉龐，以及經常帶着關懷身邊人的眼神。那時候，她已是一位宣教半個多世紀的資深傳道人、上帝所重用的使女，堪稱德高望重。可是，站在一眾弟兄姊妹當中，她卻是那麼平易近人。每當主日崇拜結束，大家在聯誼和享用茶點的時候，與她交談就像和家人閒話家常一樣，令人感到舒服和溫馨。她還予人一種虛懷若谷的氣質。何教士真正做到謙卑，是主耶穌的優秀學生。她為主耶穌和所服事的眾人完全獻上，是我們學效的榜樣。

<sup>6</sup> 筆者少時家住香港調景嶺，司務道教士所屬的基督教醫務所為我治病；當年醫生護士的愛心照顧於今印象猶深。2000年6月筆者曾踏訪司教士當年在陝南的宣教工場其中的龍駒寨（今丹鳳縣）、山陽和商縣。首站是龍駒寨。我們從西安向陝南進發，秦嶺橫互其間，一路上映入眼簾的盡是崇山峻嶺，高聳入雲而雄偉陡險。車子打從秦嶺的山洞隧道而過；可以想像司教士當年登山涉水是何等艱辛。龍駒寨基督教堂儘管飽歷風霜，然而會堂寬敞、樸素而莊嚴。帶領會堂的戴牧師和他的團隊守住了當年司教士事奉上帝

教士為中國同胞將自己最好的擺上，其「全犧牲」精神乃來華宣教士的典範和寫照。通過介紹兩位教士在戰時中國的光輝事跡，反映來華宣教士們那股義無反顧的奉獻精神，以發潛德幽光。這些宣教士們秉承上帝有關「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的教誨，篤信力行，服事中華同胞，在戰火中以大無畏的精神見證主耶穌的大愛。

所結的果實。陝南弟兄姊妹並沒有叫天上的司教士失望。筆者與龍駒寨教會弟兄姊妹訪談時，他們津津樂道司教士當年嘉言懿行；在回憶其仁愛的事跡時，令我感到那片懷念司教士而發自心坎的深情。其中一位年長的姊妹向我述說司教士抱住她的情景時，她臉上掛着的笑容告訴人其心底的滿足。據戴牧師相告，司教士當年在龍駒寨事奉的時候，經常一個人登上附近的雞公山。她喜歡在那裏獨處，向父神祈禱。在山上她得到聖靈光照，許多困惑在那裏得到上帝啟示，最後迎刃而解。例如教堂外顯得有點破舊，亟待修復。筆者2000年6月在龍駒寨教會訪問所得的印象。筆者應戴牧師之邀，於主日當天向到來龍駒寨教會崇拜上帝的弟兄姊妹作見證。弟兄姊妹們留心地聽。用過午餐以後，我們就辭別龍駒寨的弟兄姊妹，繼續陝南教會踏訪行程，往山陽教會去。戴牧師自己以種地為生，從家裏騎腳踏車返教會，來回需要好幾個小時。他那充滿喜樂和純樸的笑臉迄今仍然印在我的腦海裏。在踏訪當年司教士在陝南的事奉工場時，我住宿在離會堂不遠的旅店。翌晨一早戴牧師就領着弟兄姊妹來接我一起走上附近的雞公山。筆者和戴牧師的訪談（龍駒寨教會內，2000年6月）。這裏述說一個關於司教士登山與主獨處的故事。1942年春她到離龍駒寨五十五里的鐵里鋪佈道。在第一天早上的聚會（她負責每天三次聚會的講道）完畢後，由於講道乏力（儘管講章早已預備好），心靈異常痛苦，她緩步走到附近一座小山的山頂。在那裏她求問耶穌，究竟在她心靈裏有否甚麼罪惡攔阻聖靈的工作。聖靈讓她想起三年多前她從漢中坐貨車往西安途中，曾經吃掉了屬於同行的容牧師所買的橘子，而一直沒有告訴容牧師。這時候她這樣寫道：「小山上靜靜的沒有一個人，只有主耶穌和我。我面對着自己屬靈生命中一個重要的時刻。我清清楚楚曉得主若要用我在各村各鄉傳福音，拯救人的靈魂，造就教會，我必須向容牧師道歉，承認自己曾經把他一些橘子吃掉了，否則主不能再用我。為了顧惜自己的面子而失卻為主工作的福分，實在太不值得。終於我決定寫信給容牧師，向他坦白承認自己曾經把他的幾個橘子吃掉。下山的時候，在基督耶穌裏，赦免的平安充滿了我。我知道主赦免了我的過犯，而且主還要用我。」故事反映司教士對信仰和罪得赦免的認真和執着。她在山上和主耶穌獨處，向主認罪和求主赦免。更重要的是她可以重新得力如鷹展翅上騰，為主作更美好的工。司務道：《陝西鈴蹤——司務道教士自傳之一》（香港：基督教靈實協會，1983），頁82～83。

## 二 「一輛空的木頭車」遇上「一顆純潔順服心」

何義思教士生長於美國南加利福尼亞州山城聖芭芭菴（Santa Barbara），那是「美西、加州最美麗又最溫和的度假區。」<sup>7</sup> 義思的父母經常在家接待宣教士。她十歲時聽到一位剛從華北回來的何定牧師（Rev. Horace Houlding）述及冬日農閒時，有人駕着一輛木頭車到佈道所想請一位傳教士到村裏講福音。可是，由於大家都太忙，以致連一個傳教士也不能抽身。如是一連兩個冬天，那人只好駕着空的木頭車「失望的、獨個兒緩緩地踏入那漫長的黑夜裏。」小義思的腦海就留下這一幕：「在中國有一條鄉村想聽福音，卻只看到一輛空的木頭車。」當時她想：「要是我，我一定會去！」然後她又決定：「主啊！待我長大後，我一定去！」<sup>8</sup>

1913年，義思於美國加州史丹福大學快要念畢第二年的本科課程時，接受母親「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往中國走一趟」的建議，決定暫時休學到中國去，看看外間世界。「主啊！我願順服，求祢顯明祢的旨意吧！」當時她乘船抵達日本橫濱前夕，獨自站在船首甲板上祈求父神顯明：中國是否祇要她事奉的地方。「話猶未了，一陣不能言喻的平安和喜樂，如潮水般湧溢出來，把我完全淹沒。直到今天，那喜樂還在我心裏，歷久猶新。」<sup>9</sup> 義思這次中國之旅成為上帝向她顯明旨意的時刻。其間，她探訪了於廣東西江下游的官山鎮等地宣教的翟恩憐教士（Miss M.L. Jackson）。到埗的當晚，她被邀請參加一個聚會。「一切都是那麼簡單和直截了當，弟兄姊妹又是那樣親切；第一晚他們就已

<sup>7</sup> 李盧媛玲：〈福氣由何家園起〉，頁205。

<sup>8</sup> 何義思：《誰掌管明天》，頁11~12。

<sup>9</sup> 何義思：《誰掌管明天》，頁13。

經贏得我的心。」<sup>10</sup> 接着的兩個星期裏，她隨着翟恩憐教士在附近村鎮佈道；期間中國就是上帝要她服事之地的信念越顯得堅定。<sup>11</sup>

1914年12月何義思以宣教士身分乘船從三藩市啟航赴華，在官山鎮等地與翟恩憐教士同工服事主，開始往後服事中華同胞五十六年的宣教事業。為了接待前來官山鎮佈道所帶領聚會的牧師和訪客，何義思教士得到在加州的親人支持，於1920年正式成立希伯崙會（Hebron Mission），以位於美國南加利福尼亞州的家族經營的果園生意盈利設立宣教基金。<sup>12</sup> 何教士在華南和香港留下佳美腳蹤，開設孤兒院、難童院、老人院和花邊館，<sup>13</sup> 以及聖經學校。她讓無依無靠的孤兒、難童和老人得到看顧，而更重要的是同胞得以聽聞福音。抗戰勝利後，何教士一度返美。1955年她應建道神學院院長劉福羣牧師邀請，再度東來，這次的事奉工場是香港。她在建道神學院任教迄1971年退休。

<sup>10</sup> 何義思：《誰掌管明天》，頁16。

<sup>11</sup> 何義思甚至想不要回到美國（她認為那是浪費時間），直接留下來服事中國人。何義思：《誰掌管明天》，頁16。翟恩憐教士與何義思教士在廣東南海西樵山下官山小鎮以及粵西沿西江一帶開設福音堂，讓同胞與聞福音，引領他們信主。「1918年春天，翟恩憐三姑的健康終於不行了。近幾年來她一直拖着虛弱的身體，勉強支撐着工作，遲早都有頹於崩潰的危險。我把她送進達保羅（Paul Todd）醫院，希望她能獲得良好的治療；可是她的健康進展仍然不大……家人寫信要我回去休息一段時間，我一直都在勸翟三姑回家，因為她實在不宜留在中國。於是，11月中旬（第一次世界大戰）戰事剛結束，我們便立即乘坐一艘荷蘭客輪返抵三藩市。我在碼頭把翟三姑交給她的父親，才算完成了我的護理任務。她始終沒有康復過來，三年後便安然離世，回到父神的懷中。」何義思：《誰掌管明天》，頁27。

<sup>12</sup> 希伯崙會「由父親出任為主席，其餘的委員包括了母親、姊姊和姊夫，並兩位我們很稔熟的牧師。」何義思教士和一位女傳道人為了取得銀行存款購買建房子用的土地，憑着對上主的信心，甘願冒着盜匪襲擊和生命危險往返廣州和官山鎮。何義思：《誰掌管明天》，頁30、32。

<sup>13</sup> 在花邊館裏婦女一邊學道和認識真理，一邊從事縫製衣服花邊飾帶（主要出口美國等地）。

### 三 在抗戰的烽煙——靠着主耶穌得勝

1937年7月盧溝橋槍聲響起，中國抗日戰爭爆發。時在廣東服事同胞的何義思教士這樣形容道：「這是悠悠八年抗戰的第一響槍聲，為無數中國的農民帶來不能形容的浩劫，也是無法磨滅的痛苦和血淚。」<sup>14</sup> 在那烽火連天的歲月，何教士與同工張先生等繼續冒着生命危險，四處傳揚福音。一次，他們再訪附近的白泥村鎮。「上次我們領了一位老婦人信主，於是再探望她。發覺她已捨棄了偶像，專心依賴信靠耶穌。我們又忙着在市場、街道上講道，賣出所有的書冊，派清全部的單張。跟村民個別談話時，發覺他們的心靈都是敞開着，十分喜歡接受真理……數月後，消息傳來：這條村鎮已被炮彈夷為平地；再也沒有機會到那裏傳福音了！我們含着滿腔熱淚，但仍感謝神為我們抓住了這最後的機會——向白泥的村民傳福音。」<sup>15</sup>

何義思教士與主要以她家族成員組成的希伯倫會為中國同胞聽聞福音的決心堅定不移，義無反顧，勇往直前。1938年8月是何教士雙親金婚紀念，一貫孝敬父母的她回到加州參加慶祝。<sup>16</sup>

「十月間，廣州淪陷了，生命財產的損失無法估計。十二月第一星期，日軍來到官山；前一陣猛烈的炮轟已使政府官員撤退到西江的對岸。」<sup>17</sup> 當時在美國的何義思教士對戰況毫不知情，只「恨不得立刻飛回官山去，與一班情同骨肉的中國弟兄姊妹在一起。那時父親已是高齡八十三了，要他同意讓小女兒到一處烽火連天、性命朝不保夕的地方，

<sup>14</sup> 何義思：《誰掌管明天》，頁95。

<sup>15</sup> 何義思：《誰掌管明天》，頁96。

<sup>16</sup> 「父母的金婚紀念成了聖芭芭拉的盛事……為了方便賓客，慶祝會就在店鋪舉行。店鋪的櫃檯全被移開了，騰出空間來放長餐桌，還特別鋪上一塊地毯。姊姊一家八口和我都總動員招呼客人喝茶、吃餅。全市的牧師都成了座上客；連市長也趕來向父母親道喜，真是難得的熱鬧。」何義思：《誰掌管明天》，頁97。

<sup>17</sup> 何義思：《誰掌管明天》，頁97。

究竟不是容易。我們便天天把這事藉禱告帶到神面前，深知道不管是戰爭或和平，最安全的地方還是在神的旨意之中。與此同時，工廠方面也有平安的消息傳來了。」<sup>18</sup>「1939年2月中旬，在全體差會委員的禱告支持下，我再次朝着西面的太平洋進發。臨行的時候，父親和我緊緊相擁，大家心裏都明白，我們不可能再在這世界上相見了。但憑着彼此必在永遠的家鄉相聚的信心，潤濕的眼睛終於閃出一抹欣悅的光輝。」<sup>19</sup>

回到中國廣東官山鎮等工場後，何義思教士經歷了盜匪的搶掠、日本軍機的猛烈轟炸，以及日本兵用上了刺刀的槍尖威嚇。她為了護送嬰兒到香港的育嬰托兒所、兌換支票，以及採購物質等等要務，曾冒着極端危險，包括：盜匪擄掠和綁架，日本炮彈的襲擊，多次往返官山鎮和廣州。她真正幾番走過死蔭幽谷。<sup>20</sup>然而，這一切種種的苦難危險何教士都安然度過，靠的是她和同工們對上帝的信心，和上帝所差遣的天使護庇了他們。靠着「神施恩的手」，何義思教士和她同工所作的都蒙上帝保守和看顧。

<sup>18</sup> 何義思：《誰掌管明天》，頁98。

<sup>19</sup> 何義思：《誰掌管明天》，頁98。何義思教士回到中國工場後不久，她的父親於同年（1939年）6、7月間去世。何義思：《誰掌管明天》，頁109。

<sup>20</sup>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軍要把何義思教士捉進集中營，不果。「約有三百名日軍又來過官山一次，那是在（1941年）12月9日。鎮內的人看到他們，直覺地知道大禍臨頭了，可是這次他們的目標只有一個。眼看整隊皇軍來到禮拜堂，包圍了我們的幾間房子，所有的士兵都執着上了刺刀的步槍，虎視眈眈地守在四周，一挺重機槍就對準了我屋前大門。然後，幾個軍官衝了進去，準備把我這個美國人捉進集中營——可是，我不在那裏。」當時何義思教士在西江上游的永豐市（何教士和同工們為了被收養兒童們〔到了抗戰後期的1944年，已有一百四十名〕安全，以及考慮糧食供應，早前已把孤兒和難童救濟院遷到這裏；1944年日軍進佔山區，為了孩子安全，孤兒院和難童院再遷永豐市以北七十里外的懷集），突然發病，三天後才病癒；第四天從永豐市趕往肇慶，準備帶同早前承諾並相約好的一位負責肇慶盲童學校美國傳教士畢師母到官山鎮，後者想從肇慶取道官山下香港，準備耶誕節後乘坐輪船回國。何教士這樣記錄上帝在身上所行的神蹟奇事：「如果我不是莫名其妙地『病』了三天，畢師母和我到達官山的那天，將正是日軍前來抓人的同一日了！天上的時鐘，真是永遠不會有分秒的偏差！」何義思：《誰掌管明天》，頁125~127。



在整整抗戰八年期間，何義思教士一直與中國同胞，特別是位處廣東西江兩岸以及鄰接廣西省界附近一帶的中華兒女艱苦與共，他們一同在戰火和炮彈的威脅下度過。在整個過程中她甘之如飴，始終惦念的只是在其照顧下孤兒院和難童院的孩子們。

#### 四 司務道踏上服事中國同胞的路

司務道生於挪威荷頓市（Horten）的一個小康家庭，是家中長女，有弟妹各一人。少年時代的司教士不斷尋找人生的意義，心裏常有一種莫名的渴慕和空虛感。<sup>21</sup> 她曾嘗試用一些方法去滿足內心的空虛。例如中學時她參加了挪威社會勞工黨屬下一個青年組織，其後擔任主席。<sup>22</sup> 她也曾藉着看電影去解答有關人生的問題，但都不成功。她的努力尋找終於有了結果，那是在她中學畢業前夕。「中學畢業前，我剛滿十八歲，我開始想到未來出路的問題……但我漸漸有一個很清楚的抱負，這在當時我不明白，日後我知道，乃是神對我的呼召——我要學護士。更重要的是我盼望在護士學校裏，心靈的需要可以得着滿足。」<sup>23</sup> 1931年司務道開始就讀於護士學校，翌年復活節她清楚自己得着了主耶穌。<sup>24</sup>

<sup>21</sup> 十二周歲那天司務道問父親：「爸爸，我到底為了甚麼來到這個世界？到底活在這個世界有甚麼意義？」由於她並沒有從父親得到答案，只好暫時擱下這個有關「人生意義」的問題。司務道：《陝西羚蹤》，頁2。

<sup>22</sup> 她當時是十八歲。司務道：《陝西羚蹤》，頁3；司教士父親約翰曾擔任挪威鋼鐵工會主席。挪威電視台製作特輯《這是你的一生：司務道教士》（*This is Your Life: Sister Annie Skau Berntsen*），1985年10月20日（靈實醫院30周年）。

<sup>23</sup> 司務道：《陝西羚蹤》，頁4。

<sup>24</sup> 「從一九三一年七月至一九三二年四月，我天天不間斷地看聖經，希望可以知道怎樣可以得着耶穌。到了復活節的前幾天，我對主耶穌的渴慕更大，於是我對主說：『親愛的主耶穌，恐怕我"來"的方法不對，但我不知道怎樣"來"，我只能對你說我願意"來"，祢不能不要我，我需要祢。』我恐怕自己還不夠清楚，就在聖經裏這樣寫：『主啊！今天我就是這樣"來"了！』」

司務道興起要往中國傳福音的意念是在1934年11月25日。<sup>25</sup> 在往後兩年多的時間她認真尋問上帝：「往中國傳福音」是祂的旨意。1935年8月她參加一個青年夏令會，清楚確知這是主的旨意。「有一晚，我獨自行到營地附近一個小樹林中。俯伏在地，對主說：『主啊，我不能確定是不是祢的旨意要我到中國服事祢，由現在開始，我就跪在這裏不起來。直到祢讓我有確實的把握，我渴死、餓死都不要緊，我只要清楚是祢的旨意。』當我禱告完了，內心好像有一個微細、溫柔的聲音對我說：『我的孩子，你願不願意為我到中國去？』在過去一年，我曾多次感受主的呼召，但從未這樣肯定，這樣確實。於是我馬上回答主說：『祢的旨意要我去，我願意去。』」<sup>26</sup>

自從確定往中國去是主的旨意那天開始，司務道就感覺自己是中國人。「當我接受了主的呼召之後，漸漸發覺，整個人充滿一片愛中國人的心懷。雖然我從未接觸過一個中國人，我卻覺得中國是我的國家，中國人是我的同胞，是我的骨肉之親。從這晚開始，我只盼望可以早日到中國去事奉主。」<sup>27</sup> 自此她的心志已決，在往後悠長的半個多世紀中，她義無反顧地在中國事奉主，服事「中國同胞」。

---

「復活節的早晨，我們一班同學一起到各病房為病人唱詩歌。我記得那首詩歌是說馬利亞悲傷地在空墳中找耶穌的屍體，找不着要離去時，遇見了復活的主。當我正在唱的時候，內心有一種說不出來的奇妙感覺。從那一個時間開始，我知道自己屬於主耶穌，主耶穌屬於我。直到現在，這個寶貴的感覺從未離開過我。」

「唱完了詩，我從醫院走到宿舍。一路上，看見的花草、樹木、天空都和以前看過的不同了！一切都變得更美麗、更有生氣。因為我的生命已經改變了！我得着了主耶穌！」司務道：《陝西羚蹤》，頁9。

<sup>25</sup> 司務道：《陝西羚蹤》，頁27。

<sup>26</sup> 司務道：《陝西羚蹤》，頁28。

<sup>27</sup> 司務道：《陝西羚蹤》，頁28～29。

1936年秋、冬兩季，司務道先後向母親和所屬教會的差會負責人提及神對其選召。翌年5月，教會的牧師邀請她一起禱告：「主，你選召了安妮，我們謝謝祢，求祢也為她開路。」牧師表示已經知道主選召她到中國去，並且說：「我的孩子，早在1934年11月25日晚上，我的靈曉得主選召你到中國去。我等你來跟我說等了兩年多啦！現在我覺得時候到了！」1937年6月初教會正式宣告差會接納司務道為宣教士。在6月27日教會的年會上，她公開宣示到中國去服事主的意願。<sup>28</sup> 9月她辭卻在醫院的護士職位，隨即於10月前往英國倫敦內地會宣教士訓練學校接受宣教培訓。翌年（1938年）6月受訓完畢；9月3日從挪威首都奧斯陸（Oslo）登上遠洋輪船首途中國，宣教工場位於陝西省的南部。<sup>29</sup>

## 五 在陝南的宣教服事

1938年10月6日司務道抵達香港，在那裏她首次與「中國同胞」相遇。<sup>30</sup> 司教士在香港逗留兩個多星期後，即取道越南海防，轉乘火車至昆明；從昆明再赴重慶，數天後抵達成都。<sup>31</sup> 從成都乘汽車赴漢中而寶鷄，再從寶鷄乘火車赴西安。12月23日挪威同工諾牧師（Rev. Jacob Nordmo）在西安迎接她，他們一起從西安乘坐貨車到陝西南部的商

---

<sup>28</sup> 在年會上，「主席請我到講台上去，向會友宣佈主對我的選召，並且在一千多個弟兄姊妹面前問我說：『安妮姊妹，你是否願意奉獻自己，到中國去服事主？你願否每一天每一分鐘為耶穌和中國人活着？』……靠着主的應許，我挺挺胸，面對會眾說：『我願意。』」司務道：《陝西羚蹤》，頁30～31。

<sup>29</sup> 司務道：《陝西羚蹤》，頁x，33～40。

<sup>30</sup> 「我第一次看見我所愛的中國人，也有機會和香港的弟兄姊妹交通。我最覺得寶貴的是在聚會中看見青年人將他們的生命獻給耶穌。」司務道：《陝西羚蹤》，頁40。

<sup>31</sup> 賈玉銘牧師這時在成都佈道，每天主領三次聚會。「我每天去聽他講道，雖然我聽不懂他說的話，也看不懂新買的一本聖經，心裏卻非常快樂！」司務道：《陝西羚蹤》，頁41。

縣。（諾牧師和師母有兩個孩子，他們在陝南服事中國同胞十四年。）司教士的宣教工場包括陝南附近一帶的商縣、山陽、洛南、商南和龍駒寨（今丹鳳縣）等地。<sup>32</sup>

司務道先後在中國的陝西服事同胞十多年（1938-1951年），與「中國同胞」打成一片：說中國話、穿中國服、吃中國飯。她不畏艱辛，走遍陝南地區：從此縣到彼縣、此鄉到彼鄉，沿途登山涉水，到處醫病和傳佈福音。一次她要從商縣走到山陽縣。「從商縣往山陽有120里路，路並不好走，還要翻高山，過七十多趟河。幸好有幾名中國弟兄陪我一起走。多少次我站在山腳下，望見高峻的山嶺，心想我永遠不能爬上去的，但每次我抓着耶穌在我奉獻時所應許的話：『我的恩典是夠你用的，因為我的能力是在你的軟弱上顯得完全』，終於一步步爬上去。」<sup>33</sup> 她靠着父神的恩典征服了大自然的障礙。<sup>34</sup>

司教士憑着純潔無偽的信心服事中國同胞，認定主耶穌會在她軟弱時加能添力。同時，她得到資深挪威同工諾牧師的引領，後者的風範對其事奉生命影響很大。諾牧師的事奉精神以及對主的忠心深深鑄刻在司教士的心版上，成為司教士事奉時的榜樣。

一次在山陽縣教會，諾牧師因為連續每天帶領三次聚會，每次講道至少兩小時，以致感到極度疲乏。「別人勸他休息一會再工作，他往

<sup>32</sup> 司務道：《陝西羚蹤》，頁43。

<sup>33</sup> 司務道：《陝西羚蹤》，頁46。

<sup>34</sup> 剛到商縣後不久的一天，司教士到婦女家中傳福音，一件人間慘事叫她非常難過。一個寡婦生了十四個孩子（六男八女），「因為飢餓不堪，八個女孩生下一個就殺掉一個，五個男孩子又先後患急病死了，現在只剩下一個兒子。我聽得目瞪口呆，久久說不出話來。」司教士回到福音堂以後哭了許久，不停流淚。「我從來沒有想過人間會有這樣大的不幸和痛苦，但我也更明白了主呼召我到中國事奉祂的意義。為了將歡樂帶給更多的人，我必須抹乾眼淚，跑遍各村各鎮，跑遍大街小巷，將耶穌基督福音的種子撒播在這黑暗的地區。」司務道：《陝西羚蹤》，頁45～46。

往微笑着說：『把自己完全破碎為耶穌才最有價值。』<sup>35</sup> 一天他本來疲乏至連喝一口水的力氣都沒有；並且向司教士說：「不！不！我沒有氣力喝！我只想回到耶穌那裏！」可是，當他知道有人找他時，他就立刻接見。「這時候，有人來拍門。有一個約十六歲的男孩子說要找諾牧師。我正要告訴他牧師需要休息，諾牧師已經在喊：『進來！進來！我不疲倦！』」男孩子一進來就哭着說：『我必須承認我的罪，請你為我禱告。』我們三個人就在那裏跪下禱告。孩子得了釋放，滿有喜樂的走了。『我現在不要回到耶穌那裏去啦！我要為耶穌活着，得人如得魚。你不是說有水喝嗎？』諾牧師實在是一位完全獻上自己、為主燒盡的忠心僕人。」<sup>36</sup> 諾牧師這種「視死如歸」、忠心事主至死的精神深深感召了司教士，影響她往後的事奉。無論是在陝南（1938-1951年）或在香港（1953-1978年），我們從司教士身上彷彿都看到諾牧師忠心事奉主的影子。

## 六 司教士在陝南龍駒寨

1941年司教士遵照諾牧師的差調轉到龍駒寨宣教。<sup>37</sup> 她這樣形容自己當時的心境：「我只好離開與我同甘苦、共患難的主內弟兄姊妹，再次踏上征途。當我知道要往龍駒寨事奉主的時候，心裏着實有很多憂慮。一方面我捨不得離開山陽縣。至於龍駒寨，我和葛教士巡迴佈道時候去過一次，弟兄姊妹對我非常陌生，他們會不會歡迎我這個新來的宣教士呢？另一方面，我來到中國以後，從來未曾獨力承擔整個福音堂

<sup>35</sup> 司務道：《陝西羚蹤》，頁50。

<sup>36</sup> 司務道：《陝西羚蹤》，頁50。

<sup>37</sup> 因為那裏的蘇教士要到河南去繼續事奉。司務道：《陝西羚蹤》，頁79。

的工作。在商縣和山陽縣，分別有諾牧師和馮長老負責處理一切事情，我只作他們的助手。加上蘇教士離開龍駒寨以後，那裏的弟兄姊妹之間有些分裂的情況出現。終於我懷着戰戰兢兢的心情，在1941年秋，到達了龍駒寨。但是，出乎我意料之外，弟兄姊妹從看見我那一刻開始，待我就像自己家裏人一樣。漸漸我覺得世界上沒有一個地方比龍駒寨更可愛。直到我離開中國，除了好幾次要逃難以外，大部分的時間我住在龍駒寨，與許許多多滿了愛心的弟兄姊妹一同事奉。」<sup>38</sup>

司教士在陝南山區從事醫療宣教十三年（1938-1951年），造福當地同胞，留下佳美腳蹤。她在抗戰勝利後才於1945年底首度回到挪威故國家園一趟，得以看望年長雙親。翌年，她二度來華，重返陝南宣教工場繼續醫療服務和傳揚福音。1950年6月韓戰爆發，翌年司教士離開中國大陸，取道香港回國。1953年她應邀前來香港，參加撤自中國大陸的歐美宣教士在調景嶺難民營中的救援和傳揚福音事工。掀開了她委身服事中國同胞的新一頁。司教士為調景嶺醫療事業和靈實醫院以及基督教靈實協會忠心服務，她出任1955年成立的靈實肺病療養院（靈實醫院前身）創任護士長直到退休。司教士服務香港人民二十五年，美好地活出主耶穌的樣式：愛人如己。她治病救人，傳揚福音，在香港留下光輝的事跡，榮神益人。為表揚司教士對香港的無私奉獻和在醫療服務上的卓越成就，英女皇伊莉沙伯二世於1979年元旦向她頒發了榮譽勳章。<sup>39</sup>

<sup>38</sup> 司務道：《陝西羚蹤》，頁79~81。

<sup>39</sup> 劉義章：《盼望之灣——靈實建基五十年》（香港：商務印書館，2005），頁31。

## 七 小結

劉福羣牧師這樣描述何教士：

在父母的支援下，她遂成了一位傳教士，要將福音傳給千千萬萬未知未信的中國人。她的一生正如二十世紀的使徒行傳。她後來開辦了一間孤兒院，第二次大戰期間，銀行匯款中斷，她便教孤兒們將生絲織成布匹。有一天，我在梧州遇見何義思教士，背着一包絲織品在沿店兜售，希望賺些錢來維持孤兒們的生活。當時，忽然拉起了警報，我便請何義思教士在轟炸完畢後（如果我們都尚生還的話），到宣道會總部來找我。她依約來到，從此開始了聯絡，奠下她日後在神學院事奉的基礎。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何義思教士回到美國，一直逗留到她母親辭世後才離開。一九五三年，她來到我們當中時，她的屬靈衝勁與精神，仍舊與戰時無異，她一到埗便立刻成為建道家的一分子。現在她雖已退休，仍然是「家」中的名譽成員，她將長洲的房子送了給宣道會。

何義思教士從未接受過學院一分一毫的薪金，反而奉獻了不少金錢，資助學院的各項計劃，這些金錢皆來自她父母遺下的產業。我常常覺得不配與她同行，看見她就像看見主耶穌。這並不是英雄崇拜，而是深深的認識到在同工身上，見到基督的真正意義。<sup>40</sup>

---

<sup>40</sup> 劉福羣著，李世勳、王珊譯：《十架與冠冕》（香港：宣道書局，1979），頁159～161。

前靈實醫院行政總監梁智達醫生仍在大學醫學院供職時，因為讀了司教士自傳《荒原上》而深受感動。於是在1986年的一個風和日麗的春日，他偕同兩位醫學院同事兼友好造訪靈實醫院；接待梁氏一行三人來訪的是護士長黃茵若。<sup>41</sup> 那天三位醫生和已從靈實醫院退休十多年的司教士巧遇於「靈實臺」，後者剛自重訪闊別三十多年的陝西途經香港返國，當天正好回到靈實醫院看望老同事。那次訪問讓梁智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當晚在他準備寄給黃茵若的信函中這樣寫道：「我不知道神想藉此向我說些甚麼，只知道我在今天下午遇上兩位神的使女（Godly women）。」<sup>42</sup>

何教士和司教士都是主耶穌既忠心又良善的使女。在那烽火漫天的戰爭年代，她們分別在中國大江南北為主耶穌作見證，就像雲彩一般絢麗。<sup>43</sup> 兩位巾幗英雄對主都有堅定的信心，並且隨時隨地向上帝禱告和祈求，把宣教工場上所需的帶到祂的寶座前。她們在華的宣教事業滿

---

<sup>41</sup> 黃茵若畢業於廣華醫院護士學校，1957年9月加盟靈實肺病療養院前服務於香港山頂的明德醫院。她是首位受訓於香港公營醫院的護士學校而任職於靈實者；1962年被派赴英國深造，三年後學成回港，任助理護士長。1972年接替退休的司教士出任護士長，直到退休。劉義章：《盼望之灣》，頁47、55。

<sup>42</sup> 梁智達於1986年秋辭去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教席，翌年1月出任將軍澳區醫援會（基督教靈實協會前身）醫務總幹事兼靈實醫院院長；1991年靈實醫院加入（香港）醫院管理局，梁氏出任醫院行政總監。劉義章：《盼望之灣》，頁68～69。梁氏於2006年自靈實醫院行政總監一職退休，就任基督教靈實協會寧養院院長；這樣可以有較多時間從事臨床治療，特別是為長者病友提供靈命上的關懷。

<sup>43</sup> 司教士於1951年離開陝南，經香港回到挪威。中國政府原來讓司教士留下來繼續服務陝南的同胞；「我們剛收到西安來的電報，龍駒寨的老百姓已向省政府說明你在當地的工作情況。你不用往西安去了，我們會好好批評龍駒寨那幾位幹部，無論如何，我們要讓全世界都明白：中國政府有能力保護外國人的安全。」司務道：《陝西羚蹤》，頁133～134。後來由於中國「抗美援朝」，徹底改變了中國對外政策，司教士於1951年離開陝南，經香港回到挪威。司務道：《陝西羚蹤》，頁159。



有果效，為陷於苦難的中國同胞及時伸出了援手，讓他們的身、心、靈都得到適時的關顧，從而度過苦難的戰爭歲月。<sup>44</sup>

---

<sup>44</sup> 1986年司務道教士重訪西安。她雖然未能回到陝南看望闊別三十五年的弟兄姊妹，卻把握機會向同胞傳講福音。參觀兵馬俑時，她坐在路旁先後與約一、二百人談福音，「如同1938年至1951年我在陝西的時候一樣。」在返回旅館的路上，司教士亟盼更多中國同胞得到救恩的心跟五十年前初抵西安時同樣熱切。「車子繼續朝旅館的方向駛去，我看見一個又一個村莊，一條又一條大街小巷，一張張中國人的臉孔從我眼前閃過，我多麼願意下車徒步行走，跟每一個中國人傳講福音，述說那奇妙的救恩。車子在路上飛馳，主的話又再一次在我耳邊響起（猶如五十多年前主呼召她往中國去般）：『我可以差遣誰呢？誰肯為我去呢？』在中國，主要我跑的路我已經跑過了，現今，當主回來的日子一天天逼近的時候，惟盼神興起更多有異象、肯奉獻、輕看今生世俗名利的信徒，繼續為福音在中國地土上遍傳，甘心獻上自己短暫的一生。」司務道：《陝西狩蹤》，頁164～167。

## 撮 要

中國經過鴉片戰爭以來半個多世紀對現代文明從排拒到引進，在踏入二十世紀時，波瀾壯闊的現代化大潮在漫天烽火的內戰和抗戰下澎湃。基督教會從開始就投入中國現代化偉業中。來華宣教士遵行主耶穌基督將福音傳到地極的「大使命」同時，把人類先進文明如醫療衛生、教育文化、科學技術等引入中華。本文介紹何義思和司務道的貢獻。她們在現代中國陷於最危險的抗日戰爭時期與國人共度患難。兩人一南一北，分別在陝南和華南農村為同胞解困舒憂：開設診所和孤兒院等慈惠服務，解無數同胞於倒懸，從而為困厄於黑暗和苦難中的同胞帶來盼望的曙光。中華民族因着宣教士的大愛得以安然度過現代史上最嚴峻的考驗。接下來國人以宣教士的貢獻為基礎而繼續努力，中華大地乃逐漸開出現代文明之花。

## ABSTRACT

This article traces the lives and careers of Ruth Howe Hitchcock and Annie Skau Berntsen, missionaries in China from the United States and Norway respectively, during the Sino-Japanese War (1937-1945). Through their heroic deeds and acts, Chinese people under their care were able to survive wartime cruelties and surmount impoverishment. Through clinics, orphanages and similar social services by the missionaries, the sick were healed, the homeless were sheltered, and those under their service saw the ray of hope in life. Through their selfless sacrifices and admirable contribution in introducing modern health care, educatio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others, missionaries played an invaluable role in helping China to advance its civilization.